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重读《所罗门之歌》

赵纪萍

(山东省委党校 文史部, 山东 济南 250021)

摘 要: 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重读女权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 托尼·莫里森通过她的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对父权制、奴隶制、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与反思, 以唤起黑人民族被湮没的种族记忆和民族自豪感, 拯救黑人的精神生态危机, 呼唤人类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不同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 《所罗门之歌》; 生态女权主义; 自然; 女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1)01-0047-03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她的作品始终以复兴黑民族文化为己任, 通过探索和表现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 重写非洲文化、表现族裔话语。作为莫里森的第一部由女性形象向文化叙事转型的小说, 《所罗门之歌》具有鲜明浓郁的黑人传统文化色彩, 展示了美国黑人心灵中的文化向往与欠缺。一直以来, 研究者多从结构、创作手法、种族、黑人女性主义及互文性等方面来解读这部小说。在吸收借鉴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进一步加深、拓宽对小说的理解。

一、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 1974)和《生态女权主义: 革命或变化》(Ecologie Feminisme: Revolution ou Mutation, 1978)。^{[1] (P57)} 生态女权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将生态的观点和女权观点

相结合, 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包括各种各样致力于揭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之间联系的观点。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 认为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中任何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生态女权主义首先要质疑、解构和颠覆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即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倡导人类回归自然, 建设人的精神生态, 同时采用多元文化的视角, 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男权中心主义, 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 倡导男女平等, 消灭种族歧视与阶级歧视, 建立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生态女权主义一般认为, 在自然造化中, 有两种现象非常相似: “一种是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 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 另一种则是大地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 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2] (P62)} 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相似使他们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中总是遭遇着相同的命运。在父权制社会中, 女性与自然同处于被对象化、他者化的客体地位, 是男性主体利用、征服的对象。男权中心主义以及其对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 赵纪萍(1979-), 女, 山东莒县人, 讲师,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自然、女性、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是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的根本之所在。生态女权主义彻底否定男权中心主义,倡导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强调尊重差异、相互依存,以生态系统而非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女性、自然以及她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抑性的概念指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3] (P53)}。这是对女性美学的回归,也正是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

二、天人相谐——小说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

《所罗门之歌》虽然是以黑人男性奶娃为主人公的一部成长小说,但是女性人物在小说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莫里森在塑造奶娃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几位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们备受父权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戕害,却又在奶娃身体和精神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养分和力量——她们用身体、青春、宽容、爱情甚至生命来帮助奶娃完成自我成长。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压抑和愤懑、隐忍,表达了她们对双重压迫的反抗以及打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共同建立和谐精神家园的渴望与追求。

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2] (P62)}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父权制一直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信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总想控制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也像自然一样处于“他者”地位。

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庭里,奶娃的母亲露丝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和行动权。她童年丧母,被父亲禁锢在大房子里,不与外人接触,成了父亲的宠物。十六岁时,她嫁给了麦肯。此后,“她的头脑被压得没棱角了,她的双肩给家务劳动和操心子女压垮了,整个人都让一个男人的重压弄得没有理性了”^{[4] (P77)}。作为妻子,她彻底丧失了话语权,除了料理家庭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作为母亲,儿子对她没有丝毫的尊重;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她没有任何社会交往和求生技能,丧失了人的社会属性。露丝完全失去了自我,任何人都可以主宰她,任何重负都可以压在她身上,她完全被边缘化,是一个彻底的“他者”。

在奶娃的家中,女性始终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和压抑,奶娃的两个姐姐也不例外,她们同样是

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的牺牲品。大姐莉娜和二姐科林西安丝从小在父亲的恐吓中长大,小时候被父亲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成年后她们的感情生活又受到父亲和弟弟野蛮的干涉。结果,到了40多岁仍待字闺中,靠做绒花打发时间。露丝以及奶娃的两个姐姐的遭遇既有她们个人命运的特殊性,又体现出她们作为黑人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重压下,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下,她们被认为是落后、愚昧、有待改造的对象。她们自身的美与善在巨大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压迫下几近淹没,显现出的是她们苦痛者、困惑者的一面。她们的处境从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与自然不乏美善却被建构为需要被改造、被征服的命运何其相似。

女性不仅与自然有着相似的遭遇,而且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对自然有更深的认同。“女性对于她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的感受不同于男人,女性对自然有一种认同感,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因此,女性更接近于自然,更适合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5] (P131)}小说中的另一黑人女性、奶娃的姑姑派拉特就是一个与自然有直接联系的人。她是一个“吊着一只耳环、没有肚脐、长得像一株大黑树的女士”^{[4] (P42)}。“她是自己生出来的”^{[4] (P243)}——派拉特还没生下来时,母亲便死去,婴儿摸索着自己钻出来——她奇迹般的出生以及她平滑的腹部标志着她是自然之女。她天生狂野,成长中几乎没有受到传统女性角色的种种限制,她自由地亲近自然,与自然沟通,她不是按照哪个人的标准和愿望界定自我,她成了她自己。她始终与自然保持着亲密关系,这让她在远离人群时不孤单。更重要的是,这让她身上有了超乎常人对个人、对人类的爱和责任。她帮助小说的男主人公奶娃回归黑人文化、回归自然,让他看到黑人作为被压迫者心中充满“恨”是于事无补的,只有无条件的、胸怀宽广的爱才能让不同人种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回归和谐。

三、天人合一——在自然母亲的怀抱寻求内心和谐

生态女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内心的和谐,倡导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母体和精神家园。生态女权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回归自然,才能净化

灵魂,回归内心的和谐。

小说中奶娃的父亲麦肯·戴德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摒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以扭曲的方式表现白人主流文化之下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但仍然处于边缘境地,内心极其焦虑、空虚。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奶娃由于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和白人文化的塑形,不可避免地患上了种种失根的病症——他不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对黑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是一无所知,这使他郁郁寡欢,内心得不到片刻的平静。后来,奶娃开始了他的南方寻金之旅,来到了南方黑人聚居的地方。在南方,奶娃惊奇地看到人和自然万物平等融洽地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地对话。在森林中,他看到“人和狗在互相交谈”^{[4][P276]}人“对树木低语、和土地密谈”^{[4][P277]}。这“是早在书写文字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符号。是人类和动物彼此确实在交谈的时代的语言;……而不是人逃避或追逐的时代的语言”^{[4][P276]}。奶娃把自己交给自然,去倾听大地的声音,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走在南方的土地上,他内心感到踏实,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发现自己仅仅由于走在大地上便振奋不已。走在大地上就像是属于大地;就像他的双腿是庄稼的茎,是树木的干;他的部分躯体就这样往下延伸,延伸,一直扎进石头和土壤之中,感到在那里十分畅快——在大地上,在他脚踏的地方。他也不跛了”^{[4][P277]}。从郁郁寡欢到内心充满喜悦,从腿一长一短到脚也不跛了,这种转变让人振奋。莫里森以“一抑一扬”的手法充分彰显出自然母亲在涤荡和净化人类心灵方面的伟大力量。

奶娃的南方寻金之旅实际上是回归自然的一次启迪之旅,是他精神成长和净化的过程。奶娃在黑人老妇瑟丝指引下到山洞寻金,象征着生命和灵魂返回母体和本源。尽管奶娃没有找到金子,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却接受大自然和黑人民族古老文明的洗礼,受到文化启蒙,获得了新生。奶娃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能通过指尖与草地的接触倾听大地的述说,而且感到自己身体不协调的各个部位协调起来,“失根的感觉”慢慢消失了。在黑人文化中,大自然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人可以通过大自然获得神的启示和力量。通过这次南方之旅,奶娃了解到自己祖先的奋斗历史,重新获得了家族和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重拾黑人民族文化的自信,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净化。

在奶娃的成长过程中,女性同自然一样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女性与自然的天然亲近能够引导男性与自然接触,使得男性得以回归自然,获得新生。在奶娃的成长过程中,他身边的女性,尤其是他的姑妈派拉特,给予他引导和力量,用她们宽广的胸怀,无私的爱,引导奶娃走出狭隘的个人世界,找到自己家族的历史乃至整个黑人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派拉特的引导下,奶娃回到南方,从而有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奶娃意识到自己的男权主义思想,开始反省自己,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伤害了身边的女性。对于母亲和姑妈派拉特,奶娃意识到她们“从一开始就为挽救他的生命奋争,而他从来连一杯茶都没给她俩泡过”^{[4][328]}。当奶娃经历了大自然对他的考验和洗礼之后,他顿悟了,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自私与现在的责任,意识到身边女性对自己的养育和启迪之恩,学会了关爱他人,找到了内心的和谐。

结语

《所罗门之歌》充满了生态女权主义意识,体现了女性与自然的认同,颂扬了人性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对自然与女性关系的挖掘贯穿小说始终,作者从女性的独特视角表达了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解放自己、解放自然,摆脱“他者”命运的强烈愿望,进而批判了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和父权制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无情压榨以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表明了为解决这个危机过程中,具有女性特质的爱和关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 [1]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57.
- [2]C. 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秦喜清,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6):62-65.
- [3]周铭.威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2006,(3):53.
- [4]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5]M Cheel. 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 [M]//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ed. By I. Diamond & G. F. Orenstein: Sierra Club Books, 1990.

责任编辑:张东丽